

梅洛龐蒂

現象學與結構主義之間

Maurice Merleau-Ponty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Structuralism

詹姆斯·施密特著

James Schmidt

尚新建 杜麗燕譯

賀瑞麟校閱

梅洛龐蒂

現象學與結構主義之間

Maurice Merleau-Ponty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Structuralism

詹姆斯·施密特—著

James Schmidt

尚新建 杜麗燕—譯

賀瑞麟—校閱

致謝辭

首先我要對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甘迺迪（Steven Kennedy）以及溫克勒（John Winckler）表示謝意，感謝他們一開始所給我的鼓勵以及在等待我完稿時所付出的耐心。

由於以下這幾個人的幫助才使我更順利地完成我的工作：阿諾德（Gretchen Arnold）製版，麥當勞（Jane MacDonald）校對，而昌德勒（Carole Chandler）則「說服」頗為頑強的機器交出成品。波士頓大學研究院所提供的資助金也幫助我支付了準備手稿方面所需要的費用。

我受惠於以下四位老師——他們接引我進入梅洛龐蒂的著作：薛佛（Christopher Schaefer）、阿爾克（Hayward Alker）、葛利費斯（W. E. Griffith）以及渥爾夫（Kurt H. Wolff）。我也感激歐奈爾（John O'Neill）對於某些論題的建議，這些論題最後都安排在第三章。我首次越界入侵梅洛龐蒂的著作，是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國際變遷研究所」；該所所長理應得到我對他的感謝，不過這個感謝實在為期過晚。我的同事們柯亞克（Erazin Kohák）、梅爾曼（Jeffery Mehlman）和沙塔斯（George Psathas）既在書目上也在概念上提供許多方面的幫助。

麥卡奇（Tom McCarthy）的評論對本書原稿有很大的幫助；從他的鼓勵和支持中筆者更是受益良多。亞倫（Tim

Allen)使我避免許多錯誤的步驟、提供給我大量紮實且有用的原文出處、增加索引並且建議一些成效不錯的查詢方向。而米勒(Jim Miller)的幫助更是無法衡量。在十年前一個酷熱難挨的夏日黃昏,吃著沒有完全烹調的雞,我們會同懷特(Barry White)與貝格(Alban Berg)並且談論梅洛龐蒂。爾後,我們談了許多,我並且希望我從我們的友誼中所獲得的某些東西能夠成功地進入本書的字裡行間。

筆者與出版者要感謝西北大學出版社允許我引用由梅洛龐蒂所著而由畢揚(Joseph Bien)所譯的《辯證法的冒險》(1973)一書之文字、由梅洛龐蒂所著而由林吉斯(Alphonso Lingis)所譯的《可見的與不可見的》(1968)一書之文字;我也感謝「陸特列吉與客剛·保羅暨人道出版社」(Routledge & Kegan Paul and Humanities Press Inc.)允許我引用由梅洛龐蒂所著而由史密斯(Colin Smith)所譯的《知覺現象學》(1962)。

詹姆斯·施密特

目 錄

致謝辭	1
第一章 導論：梅洛龐蒂與社會思想	1
生平和名望	2
著作與闕文	6
概觀和一些警告	11
第二章 現象學、結構主義與人文科學	21
笛卡爾的幽靈	21
胡塞爾的笛卡爾	29
現象學與心理學	35
偏離「笛卡爾之道」	41
梅洛龐蒂的胡塞爾	44
現象學與人文科學	54
第三章 他人	89
梅洛龐蒂及其他人	89
力戰怪物：笛卡爾、黑格爾與胡塞爾	92
關於他人的注視：《知覺現象學》與《存有與虛無》	102
政治領域：《辯證法的冒險》和《共產黨員與和平》	113

可見性、肉慾、可逆性：《可見的與不可見的》	122
第四章 語言、表達和歷史的意義	155
從知覺經由表達到歷史	155
研讀（和誤讀）索緒爾	158
做為身勢的語言，做為知覺的歷史	165
索緒爾，符號和歷史問題	181
超越馬克思和胡塞爾：新的存有學	195
第五章 結論：現象學與結構主義之間	225
梅洛龐蒂處於現象學的界限	225
結構主義入口處的模稜兩可	230
涂爾幹家的宴席散了	234
梅洛龐蒂的著作	243
索引	245

第一章

導論：梅洛龐蒂與社會思想

本書旨在研究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社會思想，研究它與胡塞爾（Husserl）現象哲學的複雜關係，以及它對於以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結構主義語言學為起點的人文科學方法所採取的模稜兩可的態度。本書試圖公正地評價當代哲學和社會理論中這位難以捉摸的神祕人物。梅洛龐蒂逝世時，曾被譽為「法蘭西最偉大的現象學家」，但是，他臨終的論著，依然對胡塞爾構想的一貫性深表懷疑^①。他開拓了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問題（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最微妙的部分），同時又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最有力和最無情的批判。^②他是第一位正確評價索緒爾語言學重要性的法國哲學家，然而，甚至連他的讚賞者也承認，他意味著在索緒爾語言學中發現的東西，在索緒爾那兒就是找不到。^③他撰寫了一系列的著作，它們與當代社會理論的關聯，只有透過它們經常遭受的冷淡才能發現^④。梅洛龐蒂過去是而且現在依然是一位神秘莫測的思想家。正如他的一位諳熟的讀者曾經指出的那樣，「思索他會造成一種語詞的眩暈」。^⑤

生平和名望

梅洛龐蒂生於一九〇八年，儘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失去父親，但後來向沙特（Jean-Paul Sartre）述說童年時，依然稱之為渡過「一個無與倫比的童年」。^①隨後，他進入巴黎的詹森德薩利（Janson-de-Sailly）和路易大帝（Louis-le-Grande）等中學，一九三〇年，畢業於巴黎的高等師範學校。正是在師範學校，他初識了沙特，從此以後，在其餘生中，沙特的著作一直激勵著他，同時也使他感到困惑。三〇年代，他在幾所學校教授哲學期間，認識了李維史陀（Lévi-Strauss）和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同以天主教左翼雜誌《精神》（*Esprit*）為核心的團體有過短暫的接觸，並與阿宏（Raymond Aron）、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格諾（Raymond Queneau）、拉康（Jacques Lacan）、韋爾（Eric Weill）、布雷頓（André Breton）等人，一起在高等實習學院聆聽科熱夫（Alexandre Kojève）關於黑格爾《精神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Spirit*）的歷史性演講。三〇年代末，他對胡塞爾的現象學發生濃厚的興趣，胡塞爾試圖「開列意識的目錄，作為宇宙環境」，這些努力也是衡量他的畢生工作的標準。^②一九三八年，他完成自己的補充論文（*thèse complémentaire*）：《行為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Behaviour*），並於四年後公開發表。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期間，他在步兵團服役。德軍占領期間，他通過「社會主義與自由」抵抗組織與沙特恢復了聯繫，二者發現，他們經過不同的途徑對胡塞爾和海德格產生了共同的興趣。戰爭即將結束時，梅洛龐蒂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知覺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1945），該書利用了胡塞

爾某些尚未公開發表的手稿，這些手稿於一九四四年，從魯汶運到巴黎。^③解放後，他與沙特合作出版《現代》（*Les Temps Modernes*）雜誌，他擔任行政編輯，也發表哲學、政治、藝術方面的文章，後來，這些文章彙成一集，以《意義和無意義》為題（*Sense and Non-Sense*, 1948）重新發表。他撰寫了一系列的文章評論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小說《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為他頗有爭議的莫斯科審判的研究《人文主義與恐怖》（*Humanism and Terror*, 1947），奠定了基礎。

憑藉前兩部著作，梅洛龐蒂獲得了博士學位，並在里昂大學和師範學校任教，講授語言哲學、心理分析、完型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④，以及涂爾幹（Durkheim）、密爾（Mill）、韋伯（Weber）等人的社會理論。一九四九年，他到巴黎大學任職，主講「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學」。在那裡，他講授兒童語言和認識的發展，講授兒童與成人的關係以及（在更具理論性的層次上）現象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關係。^⑤

韓戰激化了長期的政治分歧，梅洛龐蒂與沙特決裂，並於一九五二年辭去《現代》編委的職務。^⑥同年，他出任主持法蘭西學院哲學講座，替代占據此職達卅十年之久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他把就職演說《讚美哲學》（*In Praise of Philosophy*, 1953）奉獻給母親，表示紀念。他與母親的關係始終十分密切，在他任職並與沙特分裂的那一年，他母親溘然長逝。

他在法蘭西學院開設的一系列課程和五〇年代撰寫的著作中表示，他渴望以一種對表達的說明和一種歷史哲學來完成以《知覺現象學》為開端的分析。《辯證法的冒險》（*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1955）一書，用一半以上的篇幅詳盡而辛辣地批判了沙特的哲學和政治學，考察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前途與不足。他一系列成熟的論文，後來以《符號》（*Signs*, 1960）為題成

集發表，書中哀婉的導言表明他與沙特的破裂趨於和解。這個集子考察了哲學、藝術、政治中表達的性質問題。五〇年代後半期，他開始逐步批判胡塞爾的觀點，漸漸地接受了海德格的某些思想。當時他認為，必須創立一個「新的存有學」，「不向人文主義妥協，不向自然主義妥協，最後也不向神學妥協」。^⑫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梅洛龐蒂猝然逝世。那時，他正撰寫一部著作，這部手稿在他死後以《可見的與不可見的》（*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1964）為題出版。另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大約在他到法蘭西學院任職之前便已開始著手，一九五二年左右一度中斷寫作，最後以《世界散論》（*The Prose of World*, 1969）為題公開發表。

梅洛龐蒂的寫作生涯，從沙特存在主義興起時開始，在李維史陀展開反擊的前夕而告結束。李維史陀《野性的思維》（*The Savage Mind*，此書謹以紀念梅洛龐蒂）一書，抨擊了沙特、現象學和我思（*cogito*）。^⑬整個五〇年代，梅洛龐蒂一直試圖調動權威，尋求他與沙特對現象學理解的差距，正如迪斯貢伯（*Vincent Descombes*）所說：「一九六〇年之後，權威們奮起反對一切形式的現象學」：

4

五十年代，索緒爾的語言學和李維史陀的結構人類學是他們的同盟者。一九六一年梅洛龐蒂逝世以後，這些反對沙特行動主義的同盟者，轉而反對一般的現象學，由此形成一個不規則的陣營，取名為「結構主義」。^⑭

一旦勾勒出這些線條，結構主義者便可清楚地看到，梅洛龐蒂屬於另一面，即與他們釐然有別的現象學。梅洛龐蒂對沙特的批判無論多麼激烈，回想起來，似乎只是家族內部的爭吵。戴勒茲（*Gilles Deleuze*）在評論傅科（*Michel Foucault*）時，像其他

人一樣簡明扼要地論述了近十年來出現的種種事變：

冷酷而一致地摧毀了主體，極其厭惡起源，失去起源，找回起源等概念，破壞統一意識的虛偽綜合，斥責一切以進步、意識，以及理性未來為名義的歷史神話。^⑮

⑮

傅科在評論戴勒茲時，一針見血地指出，所有這些差異均來自梅洛龐蒂：

《感覺的邏輯》（*Logique du sens*）（戴勒茲著，一九六九年版）與《知覺現象學》可能具有難以想像的明顯差異。在後一部著作中，機體通過原始意義網絡與世界相聯，原始意義發端於事物的知覺，而按照戴勒茲的觀點，幻象形成了物體一層不可入的、無形的表面。其形成過程既是局部解剖學（*topology*）的，又是無情的，由此產生某種東西，它虛假地表現為以某點為中心機體，並把事物漸增的疏遠分布在它自己的周圍。^⑯

梅洛龐蒂依然忠實於胡塞爾倡導的返回「事物本身」，並試圖在知覺世界尋找通向「真理的起源」之路，而六〇年代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對起源、返回、乃至真理一類的字眼，一般持懷疑態度。在梅洛龐蒂尋找「基礎」和「根據」的地方，他們僅僅發現了「破裂」和「轉移」。梅洛龐蒂遭受到一位法國思想家所能遇到的最殘酷的噩運：他過時了。●

5

不過，這樣閱讀他的著作未免有點兒過分簡單。他的結構主義批評家和他的現象學進路一樣，都沒有看到嚴重破壞其著作的矛盾心理。二者差不多毫無例外地依照《知覺現象學》劃定他的成就——結構主義者批判它，現象學家推崇它。然而，即使《知覺現象學》是他給人印象最深的一部著作，他的哲學創造卻沒有在

一九四五年終止。他知道需要詳盡闡發曾經提到的一些問題。他在闡述這些問題時逐步認識到，必須重新考慮《知覺現象學》賴以存在的基礎。

著作與闕文

梅洛龐蒂被提名為法蘭西學院的候選人時，曾經擬定了一份計畫，清楚地概述了他打算遵循的路線。他在計畫中將工作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一)試圖「恢復知覺世界」；(二)試圖「說明如何與他者溝通，以及思想如何達到並超越將我們引入真理之門的知覺領域」。^⑮第一個階段於一九四五年完成，包括《行為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Behaviour*）和《知覺現象學》兩部著作。第二個階段將追溯知覺世界的「昇華過程」，他在戰後撰寫的一系列文章預示了這一階段的開始——梅洛龐蒂特別強調《人文主義與恐怖》以及對塞尚（Cézanne）和波娃的小說《客人》（*L'Invitée*）的評論文章，後兩種文章收入《意義和無意義》。但是，梅洛龐蒂指出，「這些論文的哲學基礎依然需要嚴密闡述」。^⑯這項任務應由另一部著作完成，其題目暫訂為《真理的起源》（*The Origin of Truth*）。梅洛龐蒂計劃把他對文學表達的研究撰寫成文，做為該書的前言，並取名為《世界散論》。它以「不太直接」的方式，探討了知覺世界昇華為歷史所形成的符號世界的過程。其重點在說明蒙田（Montaigne）、司湯達（Stendhal）、普魯斯特（Proust）、布雷頓、阿爾博（Arbaud）、瓦萊里（Valéry）之類的作家，如何接受現存的言語習俗，以某種方式運用它們。^⑰

最初，梅洛龐蒂似乎認為《世界散論》一書相當於《什麼是文學》（*What is Literature*）之類的研究^⑱——像其他地方一樣，

沙特對於他的研究是一種刺激——然而，這部著作的內涵已經超出美學或討論的範圍。梅洛龐蒂在計畫中表示了這樣一種願望：「充分發揮散文的範疇，使其掙脫文學的桎梏，賦予它社會學的意義」。^⑲他似乎想把《世界散論》的分析當做原型，以便進一步深入社會理論的領域：

人們之間的語言關係，將幫助我們理解符號關係和制度更一般的秩序，符號關係和制度不僅確保思想的交換，而且確保一切價值形式的交換，確保人們在一種文化中共存，超出文化範圍，則在單一的歷史中共存。^⑳

梅洛龐蒂在法蘭西學院就職演說中指出，這樣考察歷史便能克服黑格爾和馬克思歷史哲學的缺陷，踏上坦途，擺脫「事物與意識之間毫無結果的對立」。^㉑

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大約在一九五二年，《世界散論》的寫作被放棄了。而且，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五年間，梅洛龐蒂雖然在法蘭西學院講授語言學、文學以及歷史課時，繼續追求就職演說中的某些內容，^㉒但是，他所發表的下一部著作，卻沒有遵守諾言，對散文範疇進行社會學方面的詳盡闡述。相反地，他從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講授的「歷史理論資料」課程中，抽取出關於韋伯和盧卡奇（Lukács）的討論，將它們與激烈批判沙特一九五二年的文章「共產主義者與和平」結合起來，構成《辯證法的冒險》一書。他在該書的前言中寫道，這部著作是一組「樣品、嘗試、哲學軼聞、分析的開端」。^㉓

若有哪位讀者尋求《知覺現象學》的續篇，期望它表明知覺生活的「壞歧意性」（bad ambiguity）如何引起表達的「好歧意性」（good ambiguity）他將立即被打住。假如梅洛龐蒂死於一九五三年，留下未完成的《世界散論》，人們或許能利用早先的一些文章，使論點變得有血有肉，如果必要，仍可求助於《知覺現

象學》，以期找出全部計畫賴以存在的一般前提。然而，梅洛龐蒂死於一九六一年，不是一九五三年，《世界散論》並非受外界阻止，而是被他所放棄。它根本不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很可能是一部梅洛龐蒂發現無法完成的著作。

可是，對渴望完成勒福爾（Claude Lefort）稱之為梅洛龐蒂「尚未完成的思想」^⑤的讀者來說，面臨的困難不僅僅是這些。由於梅洛龐蒂試圖說明表達如何吸收並超越已被拋棄的知覺世界，所以對他第一階段得出的結論表示懷疑。在他看來，不僅《世界散論》成問題，《行為的結構》和《知覺現象學》似乎更可疑。

整個五〇年代，梅洛龐蒂一直忙於一部手稿，其題目只是暫定的，一會兒叫《存有與意義》（*Being and Meaning*）一會兒叫《真實系譜》（*Genealogy of the True*），有時也叫《真理的起源》，最後定為《可見的與不可見的》^⑥。勒福爾為該書尚未完成的正文增補了一些「工作筆記」，梅洛龐蒂在筆記中強調指出，繼續研究十分必要，它將「使我最早的兩部著作得到深化和精煉」，從而使《知覺現象學》的成果變成「存有學的說明」^⑦。他覺得有必要指出，「人們所考察的心理學」（知覺現象學）實際上就是存有學，他認為，這種存有學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詳盡闡述必須取代先驗主體性（主體、客體、意義等）的那些概念」。^⑧乍一看，《可見的與不可見的》一書的目的，似乎是要表明，《知覺現象學》中關於具體主體性（incarnate subjectivity）的討論不只是為了解理解主體，更重要的是，它們是闡述存有的結構（structure of being）的入門許可。^⑨

但是，從一些工作筆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裡所進行的工作，遠不止對《知覺現象學》假設的東西進行簡單的分類；梅洛龐蒂還強調指出，「基於第一部分仍然保留了『意識』哲學這一事實」，早期著作提出的某些論述在關鍵方面尚有欠缺。^⑩他寫道，《知覺現象學》提出的問題「無法解決，因為我在那本書裡是

從『意識』——『客體』間的區分開始的」。^⑪因此，只簡單地闡明《知覺現象學》的論點還不夠。梅洛龐蒂似乎逐漸意識到，必須從反省主體之外的立場出發，重新系統闡述這些論點。他逝世前一年所作的筆記，表明他心中早已醞釀的重大修正：

以向度（dimensions）、關節（articulation）、層次（level）、樞紐（hinges）、中樞（pivots）、形態（configuration）等觀念取代概念（concept）、觀念（idea）、表象（representation）等觀念——出發點——對事物（thing）及其屬性（properties）通常觀念的批判——對主體的邏輯概念之批判以及對邏輯的基本屬性之批判——對實證的意義（意義間的區別）之批判，做為偏離（écart）的意義，謂詞理論——以這種區別的觀念為基礎（diacritical conception）。^⑫

從「意識哲學」得出的一系列術語（概念、觀念、心靈、表象），將被一系列新的術語（向度、關節、層次、樞紐、中樞、形態）所取代，這些術語既未賦予意識觀點以首要地位，也不以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區分為基礎。

甚至在明確承認必須拋棄「意識哲學」一詞之前，一個特殊的隱語便已開始出現在梅洛龐蒂公開發表的著作中。「視覺」（vision）取代了「知覺」，「肉身存在」（carnal existence）代替了「物質存在」（corporeal existence），「地球」（earth）取代了梅洛龐蒂常用的「世界」，「存有」開始用大寫字母書寫，「肉身」（flesh）或許是新範疇中最重要的術語，它逐漸獲得了顯著地位。^⑬大約與此同時，梅洛龐蒂某些作品的關鍵地方，出現了一種奇妙的動力轉變。他在最後的文章〈眼睛和心靈〉（*The Eye and the Mind*）中告訴我們，畫家常常發現自己與他們所畫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相反的，他們覺得

「事物在盯著他們」，《可見的與不可見的》一書的註釋，則強調下述說法的必然性：「事物占有我們，而不是我們占有事物……語言具有我們……不是我們具有語言……是存有在我們當中說話，而不是我們談論存有」。^⑩

- 9 至於術語、表達，以及言談當中這些變化的最終目的，我們一點兒也不清楚。《可見的與不可見的》之註釋者們曾經在此書中發現一個「從現象學向形上學」的轉換^⑪，以「存有」取代「時間」，做為主要分析範疇^⑫，拋棄了胡塞爾做為出發點的意向性概念^⑬，在某種程度上承認，「意識哲學」必然以非語言學意義的幻覺為根據支撐我思^⑭，「思維的地位之動搖」^⑮，將我思哲學「扔出窗外」^⑯，「祭殺開山鼻祖」胡塞爾——既「虔誠又無情」等等^⑰。確實，正如格里尼（Marjorie Grene）看到的那樣，在這部「高深莫測的文獻」中，或許只有一件事是「完全清楚的」，那就是梅洛龐蒂看到需要創立「一個新的（或更新）存有學」。^⑱

本書首在研究梅洛龐蒂的社會思想，而不是闡述他的存有學。但是，即使我們不打算解開梅洛龐蒂後期著作之謎，卻不能忽略這一事實：梅洛龐蒂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對早期著作的某些方面發生了懷疑。梅洛龐蒂曾經企圖詳盡闡述表達和歷史，以證實《知覺現象學》某些論點的確實性。他沒能這麼做，放棄《世界散論》之後，他開始勾畫另一個論點，並在一本與《知覺現象學》有顯著差別的書中達到頂點。認為梅洛龐蒂在表達和歷史哲學方面的失敗是他重新考慮《知覺現象學》所提問題的唯一原因，恐怕過於荒唐，然而，以為闡述表達和歷史企圖的失敗與他批判早期著作彼此毫無關聯，同樣也是荒誕不經的。它們彼此之間具有怎樣的聯繫，正是本書所要考察的問題之一。

概觀和一些警告

我所考慮的問題是，梅洛龐蒂在對知覺進行現象學闡述的社會向度所做的努力，如何促使他對最初的立場採取這樣一種態度：這個最初的立場雖然在某些方面與他死後十年間法國所興起的對現象學之批判互相平行，但依然與胡塞爾構想的主要因素發生衝突。為了闡明這個論點，我們將從三個問題考察梅洛龐蒂思想的演變：一、哲學與人文科學的關係（第二章）；二、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性質以及我們對於他者的知識之問題（第三章）；三、表達和歷史意義的特點（第四章）。這三個問題不僅闡明梅洛龐蒂思想的幾個不同方面，而且也表明他與一些重要思想家的對話如何促進他思想的發展。因此，第二章將考察梅洛龐蒂對胡塞爾和李維史陀的態度，第三章考察他與沙特風雨雨的關係，以及拉康著作對他產生的一定影響，第四章探討他對索緒爾的使用及其在解釋馬克思、韋伯、盧卡奇上的重要意義。在結論一章，我試圖以比較簡略的方式，來安置梅洛龐蒂在胡塞爾現象學和結構主義分析之間所站的最終地位。

我探索梅洛龐蒂著作的角度與眾不同。我始終將他關於社會性質之最一般的概念，以及他對人文科學的特定範圍及其特點的理解，做為論述的中心。這個焦點對於什麼該強調，什麼該忽略，必然意味著某種選擇，有一定的取舍。我冒險陳述梅洛龐蒂幾部比較嚴密的哲學著作，《行為的結構》、《知覺現象學》、《可見的與不可見的》等，因為它們揭示了梅洛龐蒂如何設想哲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關係，揭示他如何闡述「他人」，如何闡述表達和歷史。^⑲同樣，我還討論了他那幾部比較專門的政治著作，主要包括《意義和無意義》、《符號》、《人文主義與恐怖》等，它們表

明梅洛龐蒂從馬克思轉向索緒爾背後的動機¹⁰。我忍痛放棄考察他對當代心理學的批判，以便集中精力討論他對民族學、社會學，以及語言學做出的貢獻¹¹。最重要的或許是，我對梅洛龐蒂批判胡塞爾現象學的發展線索的論述，主要集中在「來自梅洛龐蒂在闡述表達和歷史哲學的嘗試失敗了」這個動力之上，因此，我不能考察他批判胡塞爾的其他可能動機。當然，不容否認，還有其他的影響在起著作用。的確，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對海德格重新產生了興趣，這對理解《可見的與不可見的》一書背後的動機，至少大有裨益。但是在這裡，我必須少談海德格（Heidegger），而更多地涉及李維史陀、拉康、以及莫斯（M. Mauss）。本書在於研究梅洛龐蒂對社會和社會科學的看法，海德格（或柏格森，或謝勒）對他存有學的發展無論發生多大的影響，與他的社會思想卻沒有什麼關係。¹²

還必須指出，關於梅洛龐蒂對其他思想家所做的特定解釋，我試圖提出比一般的二手文獻都更為直接了當的評價。梅洛龐蒂的很多解釋，不是嚴重誤解，便是隨意歪曲。譬如，他對胡塞爾的理解就十分可疑；他對索緒爾的討論，多半是錯誤的。似乎沒有什麼理由可以忽略他對其他思想家的任意解釋，尤其是當他的誤解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做為一個最好的嚮導，指引我們去理解他特別關心和強調的東西時。必須指出，對這裡所討論的許多問題，梅洛龐蒂能否給予大體上令人信服甚或正確的結論，現在根本不清楚。但是，還必須強調指出，幾乎在一切情況下，我寧願看到梅洛龐蒂的誤解和含糊其詞，也不願理睬那些比較負責卻缺乏刺激的詮釋家們謹慎而單調的註解，更不願理會那些真誠但無天賦的理論家們清晰卻又難以置信，或毫無意義的結論。梅洛龐蒂可以說是索緒爾蹩腳的讀者，其理解的不精確程度簡直令人吃驚，但是，他強加給索緒爾的話，與索緒爾實際上說的話同等重要。梅洛龐蒂為之冥思苦想的問題，其最後的結論可以說含混不

清，甚至令人暴跳如雷，不過，他所面臨的問題是真正的問題，即使沒有解決它們，至少注意到它們。

歸根結柢，這就是梅洛龐蒂的情況。他沒有回答他所提出的一切問題，但是，他通常提出的問題從那時起便是當代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他在死後的二十五年裡，依然代表了時代的潮流。他的問題也就是我們的問題，如果閱讀他的著作沒能解決它們，至少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危險何在。

12

註釋

- ①關於梅洛龐蒂的這個特徵，見呂格爾（Paul Ricoeur）：〈主體問題：符號學的挑戰〉，由麥克勞克林（K. McLaughlin）譯，收入《詮釋的衝突》（*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p.247, ft7。也見呂格爾的短文〈獻給梅洛龐蒂〉，載於《精神》（*Esprit*），29（1961），p.1115～1120。關於梅洛龐蒂與現象學關係的一般論述，見邁迪遜（Gary Brent Madison）：《梅洛龐蒂的現象學：對意識局限的考察》（*The Phenomenology of Merleau-Ponty: A Search for the Limits of Consciousness*,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1）。
- ②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認為，梅洛龐蒂《辯證法的冒險》一書的出版，標誌著「法國的討論已經恢復到德國早期的層次」：《馬克思主義在現代法國》（*Marxism in Modern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p.80, ft.5。哈伯馬斯（J. Habermas）於一九五七年關於〈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討論〉的評論，也指出梅洛龐蒂著作的重要作用，見《理論與實踐》（*Theorie und Praxis*, Frankfurt: Suhrkamp, 1971），p. 425～428。
- ③巴特（Roland Barthes）在《符號學的要素》（*Elements of Semiology*,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7），p.24，提出梅洛龐蒂的先驅角色。拉格（Maurice Lagueux）在〈梅洛龐蒂與索緒爾的語言學〉（*Merleau-Ponty et la linguistique de Saussure*）一文，全面討論了梅洛龐蒂對索緒爾解釋的特點，見《對話》（*Dialogue*）V（1965），p.351～364。
- ④舉兩個新近的例子。羅蒂（Richard Rorty）的《哲學與自然之鏡》（*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透徹批判了自笛卡爾之後占據西方哲學中心的「映現」和「反射」的隱喻，但似乎沒有意識到，梅洛龐蒂在〈眼睛和心靈〉（〈知覺的首要地位及其他論文〉p.169～178）討論笛卡爾的《屈光學》時便提出了類似的批判。同樣，詳盡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詞典》（*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ed. T. Bottomore et a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卻沒有關於梅洛龐蒂的條目，儘管其中使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一詞實際上是從梅洛龐蒂《辯證法的冒險》一書的討論開始的。

- ⑤格里尼（Marjorie Grene）：〈梅洛龐蒂與存有學的新生〉（*Merleau-Ponty and the Renewal of Ontology*）載《形上學評論》（*Review of Metaphysics*），XXIX：4（1976），p.622。
- ⑥沙特：〈梅洛龐蒂〉，見《處境》（*Situations*, trans. B. Eisler, Greenwich, Conn.: Fawcett, 1966），p.157。到一九四五年為止的詳細傳記材料，見傑拉特（Theodore F. Geraets）：《朝向一個新的先驗哲學》（*Vers une nouvelle philosophie transcendent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1），p.4～31。庫珀（Barry Cooper）的《梅洛龐蒂和馬克思主義：從恐怖到改革》（*Merleau-Ponty and Marxism: From Terror to Refor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9），p. 4～16，談及同樣的時期，特別強調科熱夫的演講對他拋棄天主教信條的重要作用。
- ⑦《行為的結構》，p.199。
- ⑧布里達（H. L. Van Breda）：〈莫里斯·梅洛龐蒂與盧汶的胡塞爾檔案〉（*Maurice Merleau-Ponty et les Archives-Husserl à Louvain*），載《形上學和倫理學雜誌》（*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67：4（1962），p.410～430，詳細論述了梅洛龐蒂運用胡塞爾遺產的情況。
- ⑨‘Gestalt’ 德文，意為「形態」，相應的英文譯語 ‘configuration’。‘Gestalt psychology’ 的創始人為韋特海默（Max Wertheimer）、柯福卡（Kurt Koffka）以及苛勒（Wolfgang Köhler），基本信念是：不能利用對各個部分的單獨分析來理解完整的全體，每一部分的性質反倒受完

整的全體所決定。因此，此處將 'Gestalt psychology' 譯為「完型心理學」。——校閱註。

⑩關於梅洛龐蒂四〇年代後期間設課程的綜合論述，見西爾弗曼 (Hugh J. Silverman) 的〈譯者前言〉，《意識與語言的獲得》英譯本，p.xxxiii～viii。

⑪沙特關於決裂的論述 (〈梅洛龐蒂〉p.188～206) 依然是基本來源，不同的解釋見布爾尼爾 (Michel-Antoine Burnier)：《行為的選擇：站在政治第一線上的法國存在主義者》(*Choice of Action: The French Existentialists on the Political Front Line*, trans. B. Murchla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p.69～76 (主要從沙特的角度出發)，以及庫珀 (見註⑥，p.102～106 更多地同情梅洛龐蒂)。

⑫《可見的與不可見的》，p.274。

⑬李維史陀：《野性的思維》(*The Savag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p.245～269；也見李維史陀關於他和梅洛龐蒂友誼的討論，〈論梅洛龐蒂〉，載《大學哲學雜誌》(*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trans. C. Gross)，7：2 (1978)，p.179～188。

⑭迪斯貢伯 (Vincent Descombes)：《當代法國哲學》(*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trans. L. Scott-Fox and J. M. Hard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p.71～72。

⑮戴勒茲：〈一位新的檔案保管員〉(*Un nouvel archiviste*)，載《批判》(*Critique*)，no.274 (1970)，p.195。

⑯傅科：《語言，反記憶，實踐》(*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trans. D. Bouchar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p.170。

⑰在《弓》(*L'Arc*) 為紀念梅洛龐蒂逝世十周年出的專號中，平構 (Bernard Pingaud) 最後評論說：「奇怪的沉默籠罩著所謂的『高級』知識界：梅洛龐蒂的名字幾乎從未被時髦的思想家所提起，雖然他在他們之前便已提出某些他們仍然面臨的問題，他的反思無論涉及政治還是語

言，心理分析還是藝術，都沒有完全喪失現實性」。見《弓》，no.46 (1971)，p.96。

⑱《知覺的首要地位及其他論文》，p.3。

⑲《知覺的首要地位及其他論文》，p.7。

⑳同上書，p.8～9。作者名單來自沙特《什麼是文字》的摘要，從一九四八年或一九四九年，勒福爾在《世界散論》的前言中引用，p.xvi；這個名單未提到瓦萊里，瓦萊里的名字主要出現 (與布雷頓一起) 在梅洛龐蒂一九五一年的講演稿，這個講稿似乎勾勒了《世界散論》觀點的草圖。早在一九四七年，梅洛龐蒂就撰寫過論述蒙田的文章 (《符號》，p.198～210)，《知覺現象學》有許多地方討論普魯斯特。

㉑勒福爾：《世界散論》的前言，p.xvi。

㉒《知覺的首要地位及其他論文》，p.9。

㉓同上。這種論點在《人與苦難》(*Man and Adversity*) 的講演稿中進一步發揮，政治與歷史的討論緊接著論布雷頓和瓦萊里的一節；見《符號》，p.235～239。

㉔《讚美哲學》，p.54。

㉕《可感世界與表達世界》(*The Sensibl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Expression*, 1952～1953)，《法蘭西學院演講主題》，p.3～11；《語言的文字運用研究》(*Studies in the Literary Use of Language*, 1952～1953)，同上書，p.12～18；《言語問題》(*The Problem of Speech*, 1953～1954)，同上書，p.19～26；《歷史理論資料》(*Materials for a Theory of History*, 1953～1954)，同上書，p.27～38；《個人歷史和公眾歷的設定》(*Institution in Personal and Public History*, 1954～1955)，同上書，p.39～45。

㉖《辯證法的冒險》，p.3。

㉗勒福爾：〈編者序言〉，《可見的與不可見的》，p.xi～xxxiii；參見梅洛龐蒂自己對胡塞爾的看法，《符號》p.159～160。

㉘勒福爾：〈編者序言〉，《可見的與不可見的》，p.xxxiv；也見《意義和無

- 意義》，p.94, ft.13。
- ⑫《可見的與不可見的》，p.168, 183。
- ⑬同上書，p.176, 167。
- ⑭馬林（Samuel B. Mallin）的《梅洛龐蒂的哲學》（*Merleau-Ponty's Philosop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試圖根據對《知覺現象學》與《可見的與不可見的》之間關係的這種理解，開發一種「境況存有學」。由於即將說明的原因，我不敢苟同這種解釋。也見我的〈莫里斯·梅洛龐蒂：政治、現象學和存有學〉一文對馬林的討論，《人的研究》（*Human Studies*），VI：3（1983），p.301～304。
- ⑮《可見的與不可見的》，p.183。
- ⑯同上書，p.200。
- ⑰同上書，p.224。
- ⑱邁迪遜說明了這些新術語的突然出現，（參見註①），p.97。
- ⑲《知覺的首要地位及其他論文》，p.167（也見《可見的與不可見的》，p.139）；《可見的與不可見的》，p.194（也見該書p.185,190）。
- ⑳克萬特（Remy C. Kwant）：《從現象學到形上學》（*From Phenomenology to Metaphysics*, Pittsburg: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㉑班奈（J. F. Bannan）：〈梅洛龐蒂的「後期」思想〉（The 'Later' Thought of Merleau-Ponty），載《對話》（*Dialogue*），V：3（1966），p.383～403。
- ㉒蒂利特（Xavier Tilliette）：《梅洛龐蒂》（*Merleau-Ponty*, Paris: Seghers, 1970），p.136～137；邁迪遜（見註①），p.32, 170, 186～187, 240, 273。
- ㉓勒福爾：〈莫里斯·梅洛龐蒂〉，收入《當代哲學：概觀》，卷三（*Contemporary Philosophy: A Survey: Vol. III: Metaphysics, Phenomenology, Language, and Structure*, Firenze: La Nuova Italia Editrice, 1969），p.206～214。
- ㉔高歇特（Marcel Gauchet）：〈思維的場所〉（*Le lieu de la pensée*），

- 載於《弓》，no.46（1971），p.19～30。
- ㉕里奇（Marc Richir）：〈扔出窗外〉（*La défenestration*），載《弓》，no.46（1971），p.31～42。
- ㉖格拉尼爾（Gérard Granel）：《胡塞爾的時間感覺和知覺》（*Le sens du temps et de la perception chez E. Husserl*, Paris: Gallimard, 1968），p.103。
- ㉗格里尼（參見註⑤），p.605。
- ㉘邁迪遜關於這三部著作之間關係的論述，被譽為關於梅洛龐蒂哲學著作的最富有思想的討論。小拉比爾（Albert Rabil, Jr）：《梅洛龐蒂：社會世界的存在主義者》（*Merleau-Ponty: Existentialist of the Social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對梅洛龐蒂的早期研究最有用。
- ㉙關於梅洛龐蒂政治著作的最詳細的討論，可以在庫珀的書（參見註①）中找到。我發現克魯克斯（Sonia Kruks）的《梅洛龐蒂的政治哲學》（*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erleau-Ponty*, Sussex: Harvester, 1981）不太充分；見我的〈莫里斯·梅洛龐蒂：政治、現象學和存有學〉，p.298～300。
- ㉚關於梅洛龐蒂對完型心理學的研究，見恩布雷（Lester Embree）：〈梅洛龐蒂對完型心理學的考察〉，收入薩利斯（John Sallis）：《梅洛龐蒂：知覺、結構、語言》（*Merleau-Ponty: Perception, Structure, Language*,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81），p.89～121。還應提到另一個研究，它涉及梅洛龐蒂社會學的意義，與我的著眼點十分接近，即斯帕林（L. Spurling）的《現象學與社會世界》（*Phenomenology and the Social Worl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7）。不過，斯帕林的主要興趣，在於梅洛龐蒂的著作與現象學社會學和民族學方法論傳統研究的關係，正如我這裡試圖說明的，那只是事情的一半兒。
- ㉛海德格對梅洛龐蒂的影響，既廣泛又難以捉摸。顯然，他對胡塞爾和沙

特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存有與時間》的影響，或許還受到《人文主義書簡》影響。同樣十分明顯，海德格後期論述語言和技術問題的著作，對梅洛龐蒂的後期著作產生深刻的影響。但是同時，梅洛龐蒂絕大多數明確的討論（應該指出，它們並不充分）十分矛盾；例如，見《知覺的首要地位及其他論文》，p.94～95，《法蘭西學院演講主題》，p.109～112。

第二章

13

現象學、結構主義與人文科學

笛卡爾的幽靈

一九二九年二月，胡塞爾在巴黎大學用下列話開始解釋現象學：

過去的哲學家，沒有哪個人像笛卡爾那樣，對現象學的觀念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現象學必然推崇他為真正的鼻祖……笛卡爾《沉思錄》（*Meditations*）的研究，已直接影響到現象學的發展形成……就這個範圍而言，現象學可以稱之為二十世紀的新笛卡爾主義。①

笛卡爾曾經指出現象學的必經之路：「凡認真考慮成為一名哲學家的人，一生中必然有一次退居自身之中，然後由此出發，努力摧毀並重建以往的一切學問。」②

三十年後，李維史陀在日內瓦號召當地人伸出救援之手，破除這位現象學創始人對人文科學的魔咒：

要使自己得到他人的接受（民族學家賦予人類知識的目標），首先必須在自己中否定自我。這一原則的發現應歸功於盧梭，人的科學只能建立在這個原則的基礎

之上。但是，只要世上流行的哲學依然將我思作為出發點，依然為假設的自我證明所束縛，這個原則便難以為人接受和理解。③

- 14 笛卡爾相信能直接「從人的內在性進入世界的外在性」，他忘記了，「社會、文明——換言之，人的世界——恰恰置於這兩極之間」。④

對胡塞爾來說，笛卡爾是哲學必須效仿的典範；對李維史陀來說，笛卡爾是人文科學必須拋棄的一切東西的象徵。梅洛龐蒂則認為，笛卡爾是洞悉哲學與科學之間「平衡的奧秘」（secret of equilibrium）的最後一個人，後來的幾代人，既不能完全恢復這種平衡，也不能完全忘記它。在笛卡爾的體系中，科學、哲學以及神學彼此互相支持，因為「心靈宇宙沒有裂縫」，「人們依然處於三條道路的入口處」⑤。這種平衡已經「永遠失去了」，但是，它的記憶仍然纏繞著哲學和人文科學：「我們的科學和哲學是對笛卡爾主義忠實和不忠實的兩個結果，兩個怪物均出自它的分裂」。⑥

實際上，梅洛龐蒂的全部著作，可以看做一種嘗試，試圖將笛卡爾以來彼此敵對的各部分重新結合起來。他的前兩部著作，展示了他對行為和完型心理學進行實質性經驗探索的卓越才能。他在巴黎大學開授的課程，深入發展心理學和語言學的廣泛領域。他研究了涂爾幹和莫斯的著作，他也是李維史陀著作的熱情註釋者。儘管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逐漸接近海德格，但還是責備海德格過分性急地宣告哲學的沉寂，忽略了自然科學的發展對存有學基本問題的揭示。⑦

梅洛龐蒂從現象學中發現一種哲學，它似乎單單向經驗科學成果開放。李維史陀——他所接觸的具有哲學洞察力的「非哲學家」之一⑧——卻認為，由於胡塞爾試圖使「我思哲學」成為永恆，所以，他學說的發展長期遭受挫折。關於胡塞爾現象學對人

文科學的實際意義，具有各種不同的評價，我們考察梅洛龐蒂的社會思想，便從這些不同的評價開始。

在土耳其浴中

15

梅洛龐蒂和李維史陀是同齡人，都生於一九〇八年——這個事實引起李維史陀在法蘭西學院就職演說開始時所說的一系列與「8」相聯的神秘關係。⑨他們首次相遇是一九三〇年，那時，他們與西蒙·德·波娃一道，在詹森德薩利學校接受「教師學銜考試」（agrégation）的訓練；所謂「教師學銜考試」指的是，證明有資格在中學教書的考試。⑩

像波娃比較熟悉的老朋友沙特一樣，梅洛龐蒂和李維史陀也對他們所學的學院哲學深感厭惡。沙特發現那些「權威課程」（cours magistral）相當「愚蠢」，「甚至永遠不去巴黎大學」。⑪驅使他轉向哲學的那些問題——為什麼沒有哲學，我們的生活便有所缺憾？生活意味著什麼？——課堂上並沒有給以回答：

無益而嚴重的是，我們的教師對歷史一無所知。他們回答說，這些問題根本不應該問，不過是一些拙劣的表達；或者（這時，每個教師都會抽搐）回答說，「答案必將在問題中發現」。未做任何回答的一位教師說，
 思索就是權衡。⑫

李維史陀對他享有盛譽的「高級」教師古羅德里哥（Gustave Rodrigues）並無好感：

他的確是法國社會主義黨好鬥的一員，但是就哲學層面而言，他所提供的卻是柏格森主義和新康德主義的混合物……他用極大的熱情陳述他那枯燥的教條主義觀

點，慷慨激昂的情緒充斥著課堂。我從來不知道，這麼天真的信念居然會與更嚴重的智力貧乏聯繫在一起。^⑬

16 梅洛龐蒂的反應也是如此。他將所學的全部課程描述為「向康德的三大批判進軍」。這種課程根本不考慮藝術，他者問題和歷史；它將言語歸結為「純意識」思維的「外在伴隨物」。^⑭所有這些問題，顯然屬於實驗心理學和社會學，它們所需要的哲學，更情願面對歧意性，而不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在我們眼前徹底崩潰」的理性主義。^⑮

沙特、李維史陀、梅洛龐蒂等人反對的傳統，集中體現在布隆施維希（Léon Brunschvicg）身上，從一九〇九至一九四〇年德軍占領期間，他對巴黎大學的哲學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沙特的朋友和同學尼贊（Paul Nizan），在一九三一年寫的小說《艾登，阿拉比》（*Aden, Arabie*）裡，為這個人勾勒了一幅令人作嘔的肖像。

這位詭辯論的小小傳播者，長著一幅舊時管家的像貌，後來生活好轉，變得腦滿腸肥，並蓄著一撮鬍鬚……他擠眉弄眼，謊語橫飛，彷彿它們便是理性的判決，每次講話他都提出：把它留給我吧，一切都會正常，我能把一切在靈魂和科學中定位。^⑯

至於布隆施維希的思想，按照梅洛龐蒂一九五九年的平靜回憶，主要是以康德和笛卡爾為模式，「努力反思，返回自我」^⑰。他認為知識對象的存在與創造它們的判斷活動有關；係詞「是」對這些知識對象並沒有存在的力量——這個論點使馬塞爾（Gabriel Marcel）十分煩惱，對梅洛龐蒂的早期也有影響——它僅僅表明意識通過自身活動進行的綜合。^⑱然而，對布隆施維希來說，意識並不是一個靜態的範疇。西方思想史，可以看做是從個體我思走向普遍我思的進步過程（時有中斷），在科學、數

學和哲學反思中，可以找到它的最純粹的表達。而這一點，恰恰是尼贊、沙特、李維史陀、梅洛龐蒂等人所不能接受的。經驗的歷史與布隆施維希的「意識的進步」（*progrès de la conscience*）很少有相似之處，他所重視的科學意識活動，絲毫也不能說明具體個體的生活。^⑲

怎麼辦？李維史陀偶然看到洛伊（Robert H. Lowie）的《原始社會》（*Primitive Society*），找到了答案，最後，他於一九三四年轉向民族學領域，終於逃出哲學「幽閉的土耳其浴氣氛」。^⑳尼贊得出的結論更早。二〇年代中期，尼贊加入「哲學」小組，這是一個青年激進知識分子的團體[其中有波利澤（Georges Politzer）、勒費弗爾（Henri Lefebvre）、古特曼（Norbert Gutermann）]，在反對當時的法國哲學這一方面，他們有時也與布雷頓的超現實主義者（Surrealist）^㉑結盟。^㉒梅洛龐蒂發現一種哲學方法，遠比布隆施維希在柏格森著作中看到的更具體，更少反思性。^㉓沃爾（Jean Wahl）一九三二年對詹姆斯（William James）、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馬塞爾的研究《走向具體》（*Vers le concret*），奏響了沙特和梅洛龐蒂的和弦。^㉔科熱夫關於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一系列演講（對黑格著作進行了完全世俗和人類學的解釋）對梅洛龐蒂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㉕但是，據證明，對梅洛龐蒂和沙特最具有決定作用的思想家是胡塞爾。

17

等待現象學

梅洛龐蒂一九四五年寫道，現象學在充分意識到自身是一種哲學之前，「一直做為一個運動而存在」：

現象學已進展很久了，它的信徒隨時隨地可以發現它，黑格爾和杞克果（Kierkegaard）那兒自然不必